

基于嵌入性的社会工程

——对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一种理解

高云红, 尹海洁, 郑中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斯科特对 20 世纪大型社会工程的实施与失败的原因给出了有力的解释与批评。基于对科学与理性的坚定信心, 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趋向于忽视实践知识和非正式过程; 与此同时, 非正式过程与实践知识在不断修正和弥补由此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社会工程只有嵌入于非正式过程, 重视实践知识和地方知识才能够实现本原目的。最终, 社会工程需要包含一种反思性知识维度。

关键词: 斯科特; 社会工程; 极端现代主义; 非正式过程; 实践知识; 反思性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12)01-0076-09

20 世纪大型社会工程的实施与失败,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1] (以下简称《国家的视角》) 一书为分析这一问题, 提供了最有说服力和洞察力的解释之一。

目前, 国内学者对于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 农民的日常反抗》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以及《支配与反抗的艺术: 隐藏的文本》中的观点给予了普遍关注, 针对其关于底层抗争方面的论述已有颇多分析与借鉴。而相对地对《国家的视角》的讨论尚不充分, 而且有限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对斯科特关于现代大型社会工程产生的条件乃至失败的原因的重述和分析, 如黄岩对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清晰化和简单化手段的分析^[2]; 鲍磊、高王凌、梁艳利等从极端现代主义的运作逻辑评述了斯科特的观点^[3-5]; 吴小彬从国家强制推行现代化与软弱公民的无力反抗的关系上将斯科特的观点和汉娜·阿伦特的观点进行了对话^[6]; 吕鹏

在鲍曼的启发下, 将拯救失败的社会工程的希望寄托于个体承担“道德责任”而非简单地寄托于政策制定者对实践知识的关注^[7]。

我们认为, 斯科特并没有将希望单独地寄托给“国家”及其“代理人”。他认为, 大型社会工程的产生有四个条件, 即极端现代主义、简单化与清晰化、独裁主义国家和软弱的公民社会^{[1] 中文版导言 4-6}。从这四个条件出发, 斯科特似乎认为, 对于大型社会工程潜在问题的解决, 也正在于这四个条件的改变: 除了社会工程的认识论基础与视角的转变, 社会工程的社会基础也应发生转变(“更有弹性、多元目标、分权社会”^{[1]486}), 从而容纳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认为, 斯科特的社会工程观实际上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下, 强调社会工程的嵌入性, 也就是正式过程嵌入于非正式过程之中。本文正是从嵌入性视角入手, 重新解读《国家的视角》一书中的主要观点。

收稿日期: 2011-12-05; 修回日期: 2012-02-06

作者简介: 高云红(1981-), 女,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社会工程。E-mail: qiuxiangxiaoyu@163.com

尹海洁(1958-), 女, 教授, 研究方向为工程与科技社会学。E-mail: yhjie@hit.edu.cn

郑中玉(1977-), 男,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社会工程与都市政治。E-mail: zheng_zhyu@163.com

1 极端现代主义社会工程的谬误所在

斯科特通过对科学林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城市规划、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庄、苏维埃集体农庄和工业化农业等大型社会工程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害的泛滥提供了条件”^{[1]中文版序言 2}。简单化和清晰化^①只是作为必要的前提在技术上提供了一种可能,“对我们和我们环境的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对认识论知识的普遍主义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结合”^{[1]469}。而这些社会工程推进的过程无论是柔和的还是强制的,最终都是失败的,给当地的生态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斯科特批判了所谓的规划者对实践知识的忽略,赞扬了“米提斯”^②和“随机应变”如何缓解和弥补了社会工程带来的危害。书中最后谨慎地给出类似波普尔“零星的社会工程”的建议。

斯科特借用了大卫·哈维“极端现代主义”概念。极端现代主义可以理解为“科学和科技进步的强烈甚至僵化的信念”^{[1]117}。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而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1]117-118},是国家为社会问题开的处方。作为一种信仰,它超越了政治倾向,为各政治流派所接受,无论是左

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使“权术和争吵都被排除在外”^{[1]216},和具体的制度安排之间具有“有择亲和力”^{[1]292}(elective affinity)。

对极端现代主义的信仰经常遭遇到抵制。斯科特并没有详细地考察极端现代主义计划的所有潜在障碍,他自己更多的是讨论这种极端现代主义造成的危害,而哈耶克从认识论上给出了具有说明力和解释力的分析。极端现代主义概念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所批驳的“唯科学主义”同源。19世纪上半叶,“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要求其自身具有特殊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这种态度极其成功使得其他领域的学者为之着迷,并马上开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哈耶克认为,这种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开始展开对其他学科的专制和主宰^{[8]4}。结果类似孔德之流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急切地表明自己的方法与那些成功的“科学”之相同,而不是把自己的方法用到自己特殊问题的研究上。这种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唯科学主义”。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对科学和技术的盲目自信,以及对借助科学技术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和设计的强大信心。这只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是指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哈耶克指的是“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8]6}。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只是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把某些思维用于和形成这种思维的领域不同的地方。而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哈耶克把它称为“工程学思维类型”。但是,把工程学的

① 斯科特通过对科学林业、度量制度的统一、土地清册等事例向我们介绍了“简单化与清晰化”,即通过去掉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其更突出、更易被度量、更易被操控,进而重塑事实的一种方式。国家利用“简单化与清晰化”手段,不仅可以描绘事实,还可以改变事实。但是,斯科特同时指出,通过“简单化与清晰化”手段所描绘出的“概括性的”、“标准化的”图景与真实的图景相距甚远。

② 斯科特在书中引入了“米提斯”(mētis)这一源于古希腊人的概念来传达他对“实践技能”的理解。米提斯在英语中经常被翻译为“狡猾的”或者“狡猾的智能”。斯科特认为,这种翻译无法公正地反映米提斯所包括的知识和技能。他认为,“米提斯”包括了对在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而“本土技术知识(indigenous technical knowledge)”、“民间智慧(folk wisdom)”、“实践技能(practical skills)”、“技术知识(techné)”等术语都无法精确地表达出“米提斯”的本质。“米提斯”不易言传,必须在实践中习得。“米提斯”知识具有地方性和特殊性的特征,在变异的、不确定的和特殊背景下才有价值;与之相对的是“一般的”和“抽象的”知识。

这个概念从希腊神话继承而来。米提斯是宙斯的第一个新娘,她欺骗克罗诺斯吃了一种药草,使他吃下后吐出宙斯的哥哥们,克洛诺斯很怕他们起来反对他。宙斯反过来吞吃了米提斯,在她生出雅典娜之前就吸收了她的智慧和诡计。雅典娜后来是从宙斯的大腿中出生的。^{[1]428-432}

技术运用到社会, 实际上要求领导者具备有关社会的全部知识。在这个意义上, “集中的经济计划不过是把这种工程学原理应用于整个社会, 它所依据的假设是, 所有相关知识的全面集中是可以办到的”^{[8]103}。如此一来, 只要能够掌握团体中的成员所知道的全部事实, 人们就可以对一个群体进行安排或控制^{[9]73}, 或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他周围的环境^{[9]26}。而作为极端现代主义的信徒, 设计者就是认为通过“简单化”和“清晰化”的手段就能掌握控制国家所需要的信息, 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

哈耶克在这里暗示了“唯科学主义”往往会引发精英主义, 这也正是斯科特所批判的狂妄分子“强烈而固执的自信”^{[1]引言: 4}的思想来源, 他们很难相信还存在着源于特意试验以外的任何有用的知识, 或承认他们自己的理性传统之外任何传统的效用^{[9]58}。哈耶克从根本上批判了这种观点, 认为, 知识是分散而不确定的, 理性是有限的, “没有, 也不可能有一个超级头脑或机构”能够收集所有的信息和知识, 从而为每个人做决策。这是一个“荒唐骗局”, 从技术上就不可能实现^{[9]96-98}。因此, 他反对全盘性的设计, 认为“自觉的设计在某个时刻露面并取代进化过程, 这是用超自然的假设代替科学的解释”^{[9]21}。

斯科特认同了分散知识理论, 沿着哈耶克的路径分析了集中规划的不可能性, 承认“即使有更多时间、更好的技术技能和更好的态度, 也不可能完成如此大量的信息搜集和消化工作, 从而取得成功”^{[1]333}, 而事实上极端现代主义取向的社会工程的狂妄和荒诞之处, 正是在于它在如此缺少信息的情况下, 狂妄地推行其设计^{[1]332}。但斯科特并没有走得像哈耶克那么远, 他对设计持一种更加辩证的态度。他并不反对设计本身, 他批判的是那种偏执的、霸权的, 推动同质性的计

划。比如, 斯科特提到, 苏维埃农庄的设计不过是当时美国的一些工程师在芝加哥饭店的一个房间花了两个星期就设计好的。在这些工程师眼里, “他们的假设, 也就是关键因素是抽象的、技术上相互关联的, 它们与背景无关”^{[1]266-267}。在《国家的视角》中所讨论的极端现代主义的社会工程设计, 自认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 这在城市设计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正统的城市设计理论代表人物勒库布西耶^①宣扬了极端现代主义所蕴含的逻辑, 他设计的城市是庞大的、功能分割而单一的、强调视觉秩序的。斯科特批判勒库布西耶式的城市是“纸上的城市, 与生活本身毫无关系”^{[1]153}, 城市规划也涉及对生活的设想, 但却超脱实践, 充斥着对人们私人生活的道德说教^{[10]42②}, 尽管有为社会活动准备的空间, 但他提不出居民的任何社会和文化需求。勒库布西耶根本不承认他所为之设计的居民在城市设计方面有什么发言权, 也不承认他们的需求是多重而不是单一的^{[1]155}。设计者是在对人们行为不真实的理性化基础上进行设计的, 是在为“异常抽象”的标准化公民做设计, 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独特的属性, 把他们当成统计数字来呈现, 作为没有反应性的纯客体随意摆布和改造, 剥夺了其主体地位。不管是埃塞俄比亚移民, 还是坦桑尼亚村庄化, “移民”从来不是提议, 不是商量, 而是直接命令与驱使, 甚至是强制暴力。规划者就像是裁缝, 不仅自由地发明他们喜欢的服装样式, 而且可以自由地剪裁顾客以适应尺度^{[1]194}。

斯科特指出, 极端现代主义的困境在于它用科学知识的权威讨论人的生存状态并排斥其他看法^{[1]123-125}。应该说, 这种极端现代主义的信仰天然地与对实践知识的贬低与摒弃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获得这些知识。这种取向的社会工程, 割裂了非正式过程和正式过程的关系;

①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 被译为“勒·柯布西耶”。

② 在《国家的视角》中, 王晓毅将之翻译为“雅各布”。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 金衡山将之译为“简·雅各布斯”。本文取后一种译法。

同时,也割裂了社会工程设计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用一种主客体对立的关系取代了互为主体的可能。

2 嵌入于非正式过程的社会工程

从斯科特的分析来看,适当地抽象是必要的,简单化、清晰化为社会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可能,但是被设计出来的秩序一定是简单的,经常忽视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那些立足于极端现代主义的运作逻辑基础上设计的社会工程都会失败,因为它缺乏对历史、对当地知识的了解与尊重,忽视了非正式过程和不可预见的偶发事件中的随机行动。更何况,有生命力的实践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人们运用实践知识发展起来的。它独立于“设计”之外。斯科特并非简单地停留在对极端现代主义思想忽略实践知识的批判之上。在每个案例的分析过程中,斯科特都是立足于正式过程与非正式过程的关系,深入地讨论了极端现代主义取向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危害,以及非正式过程对于正式过程的抵抗和挽救,而在书中最后他给出的“谨慎的社会工程”的建议也正是一种对实践知识和非正式过程的尊重。

2.1 正式过程之嵌入于非正式过程

斯科特在分析的过程中,提出了类似于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的论断,认为正式过程嵌入于非正式过程之中。他一再强调,“如果没有正式项目所忽略的那些实践知识的参与,正式的规划是无法立足的”^{[1]导言 8}。斯科特直截了当地指出,正式项目实际上寄生于非正式的过程,没有这些非正式的过程,正式项目既不能产生,也不可能存在^{[1]导言 6}。他进一步认为:“正式程序的社会工程系统实际只是一个子系统。子系统需要依靠各种自己不能创造和维持的过程,这些过程经常是非正式和有先例的。正式程序越是图解式的、越薄弱、越简单,那么在遇到来自其狭小范围之外的

干扰时候,它就越脆弱和缺少弹性。……市场是制度化的、正式的运行系统,尽管它给参与者留出了活动空间,它也同样依赖于它本身的计算法所无法了解的更大的社会关系系统,这是它无法创造,也无法保持的。……社会信任、社区、合作的模式和规范,没有它们,市场交换是难以想象的。”^{[1]483}斯科特在分析17、18世纪丹麦、挪威的土地制度时,区分了“纸上的事实”和“实际的事实”。在这些类似的地区中,不可能把某一块土地与某一个家庭和个人联系起来,大家分享着公共土地的价值。这些官员根本无法取得和“实际的事实”一致的“纸上的事实”,实际上,国家不是根据现实来制定地图,而是强加一个与财政格局相一致的财产制度。在土地档案办公室的官方文件之下或之外隐藏着另一个影子般的土地制度系统^{[1]61}。而其他地区的土地拥有者私下的交易行为并不会完全反映到“纸上”,他们有一套完全迥异于制度本身的实践。合法怠工的经验表明,严格按照正式规定工作比主动地工作低效,真正的工作过程严重地依赖非正式的理解和即兴的行动,而不是正规的工作制度^{[1]425}。巴黎出租车司机的怠工方式就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而这恰恰是造成巴黎交通瘫痪的最佳方式。斯科特进一步强调,“社会工程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它的效率依赖于真正的人类主体的反应和合作。如果人们发现新的安排,不管安排如何有效率,只要与他们的尊严、计划、趣味相背离,他们就会将它们变成低效率的安排”^{[1]299}。

斯科特在对城市设计的批判中,极为赞赏简·雅各布斯的思想:维持秩序的正式公共制度只有在这种丰富的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支持下才能成功地发挥功能^{[1]182}。简·雅各布斯在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批判了勒库布西耶式的城市设计。她向我们展现了秩序和安全如何体现在非正式过程中。她指出,城市街道的安宁,不是主要由警察来维持的,尽管这

是警察的责任。它主要是由一个互相关联的, 非正式的网络来维持的, 这是一个有着自觉的抑制手段和标准的网络, 由人们自行产生, 也由其强制执行^{[10]32}。在斯科特看来, “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总是寄生于非正式过程, 虽然正式过程并不承认非正式过程的存在, 但没有它们又无法生存”^{[1]424-425}。总之, 斯科特强调的似乎是在正式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大量非正式过程。这些非正式过程使得正式过程得以保存, 被修改或被抵制。

改变一个机构的正式结构远比改变实践更容易。重新设计组织结构也比改变组织实际运行容易得多。法律和法规改变起来比较容易。政治精英们通常都是从改变正式结构和规则开始, 但是正式的和成文的规则不能解释机构如何成功运作。“真正对机构顺利运行的解释是无穷的、不断变动的隐含理解、默契的协调和实践上的互动, 成文的文件根本不可能掌握这些内容。这个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就是……实践知识, 这些知识完全是在正式规则之外, 有时甚至与正式制度相矛盾。”^{[1]347}我们认为斯科特对正式规则和过程与非正式过程关系的理解与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的分析基本一致。格兰诺维特^[11]认为, 经济行动不像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在匿名的竞争市场中以契约来连接交易双方, 也不是像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在企业内部靠一种正式权威命令结构协调经济行为。在市场和企业(科层制)两个界面上, 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网络。那些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而不是“或明或暗的契约”, 或“权威结构”协调着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带来信任、阻止违法乱纪行为, 并形成经济秩序。当然, 就社会工程的讨论而言, 正式过程除了嵌入于非正式过程之外, 非正式过程常常形成对正式过程的反抗与抵制。这里潜藏着的是社会工程中的权力斗争过程及其策略。

2.2 非正式过程的反抗与发展: 黑色的双生子

国家机构的简单化重塑了人民和景观, 它制造出来的“纸上的事实”和“标准化事实”最终变成了真正的事实, 并盛行。国家机构所使用的分类是权威的曲调, 大多数人都必须与之合拍^{[1]110}。但正如斯科特所言: “我们不仅要意识到国家通过简单化改变世界的的能力, 还要看到社会在修改、扰乱、阻碍, 甚至是颠覆外界强加的各种条款方面的能力”^{[1]60-61}。这种“变革与抗拒”的双重运动, 与卡尔·波兰尼^[12]在《大转型》中所论述的和社会的双重运动在过程上惊人的相似。卡尔·波兰尼不仅描绘了市场对社会的脱嵌过程, 同时还描绘了社会的抗拒过程。卡尔·波兰尼认为, 真正的自由主义经济从未真正存在过, 社会的抗拒阻止了市场体系的自我调节。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 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波兰尼进一步认为, 同时也正是这种社会的自我保护原则和过程, 使得自由市场经济的破坏作用被降低, 否则人类社会早就“烟消云散”了。

同样的, 极端现代主义取向的社会工程虽然在独裁主义的帮助下得以推动, 但是它从未按照其设计的存在, 而是经过非正式过程抗拒、修改后的社会工程。应该说, 地方的实践与国家理论从来不是一致的。“人类对各种严格的社会束缚形式的抵抗使得这些来自中央理性的单一项目从来未曾实现过”^{[1]479}。就如极端现代主义逻辑下规划的巴西利亚从未实现, 而出现了仿佛“黑色的双生子”未经规划的巴西利亚^{[1]354}。规划的巴西利亚的设计没有参照任何巴西过去的习惯, 传统和实践。它作为一个示范城市, 完全符合正统的城市规划理念, 被设计成为一个有序、现代、高效的城市。但是, 这样的城市受到了不同利益的巴西利亚人和他们表达自己意愿的决心的重构。事实是, 到1980年, 75%的巴西利亚人生活在事先规划之外的定居点上。规划的巴西利亚试图塑造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城市, 但实际上巴西利亚

则仍然是一个按照社会阶级进行空间分割的城市,并且在规划的巴西利亚之外还存在一个未经规划的巴西利亚,也就是被非正式占用的城市空间^{[1]173}。重要的是,这种规划外的巴西利亚不仅仅是偶然的事情。规划中心的秩序和清晰是以边缘地区规划外的巴西利亚为代价支撑起来的。两个巴西利亚是共生的关系。“真实的巴西利亚带有明显的反抗、颠覆和政治考虑”。而被规划城市致命的弱点不仅在于它不能尊重自治的目标和当地居民的主动性,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居民之间相互影响与其后果的偶然性^{[1]192}。

在对斯科特的解读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大型社会工程从国家的视角(正式过程的维度)^①来看是成功的,从人民的视角(非正式过程维度)^②才是失败的^[2-3]。但是,事实上,即使从正式过程的维度来看,这些大型的社会工程也是失败的^③,它们在抽象、逻辑的思维框架下,从未意识到社会的能动性和反应。非正式过程为正式过程提供了支持,但是如果正式过程想要脱离非正式过程而存在,往往是不可能的。非正式过程对正式过程的抵抗,将对极端现代主义起到抵制作用,使正式过程永远无法按照设想的样子来运行。这种观点在《弱者的武器》中也有体现。斯科特在描述农民的日常反抗的时候,总结道“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规划或项目带来的高收益可以被农民消极的反抗消失殆尽”^{[13]37}。从这个意义出发,波兰尼意义上的“社会的抵抗”是始终存在的。斯科特所期望的“代议制制度”可能为强大的公民社会留下政治空间,并对大型社会工程的推进实施社会的抵制;但是社会从未停止过非正式的抵抗,无论这个公民社会是微弱还是强大,也不管他们的手段是积极地抵抗还是运用所谓“弱者的武器”消极地抵抗。而这些“抵抗”不断改变或重构着社会工程的效果和方向。“统治者绝非总是那

些游戏的胜利者”^{[13]前言3},斯科特如是说。

2.3 非正式过程对社会工程的挽救

应该说,这些大型社会工程的运行过程中,随着其危害的逐渐显现,设计者和实施者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作为科学林业的先驱,德国最早认识到科学林业的不良后果,并试图补救,为此发明了所谓的“林业卫生学”,也就是以生态和生物的方式恢复或重新创造森林的生态。但是这种补救并未超越极端现代主义逻辑下的简单化和单一化思想,不可能达到补救的目的。

极端现代主义社会工程破坏了凝聚力和行动力,但是作为非正式过程的米提斯对正式过程的抵抗,除了改变正式过程的走向,还抵御了极端现代主义社会工程的危害,挽救了社会工程。人们在具体的实践中,利用“变通”策略来逃避正式过程带来的伤害,这种在正式制度之外的随机应变,尽管这有可能是非法的,或者正式制度明令禁止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斯科特在书中举了在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的两个工厂中,如何依靠非官方的米提斯来运行工厂的例子。斯科特的例证表明,“社会工程设计中所编制的正式秩序的确遗漏了许多对于它们的实际功能至关重要的因素。……指令经济经常需要依赖计划之外的非正式经济的令人绝望的即兴表演才能勉强前进。”^{[1]483}而“那些没有完全毁灭而保存下来的计划,主要归功于计划本身所不曾预见或被明令禁止的孤注一掷的办法”^{[1]424}。比如坦桑尼亚强制村庄化之所以破坏性没有苏联集体农庄那么大,斯科特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它的强制力没有苏联那么蛮横。而苏联的集体农庄存在了60年并不是因为国家计划,而是那些非正规的行动、灰色市场、物物交易和灵活性。这些非正式过程弥补了失败。“在正式的指令经济之外,常常是不符合苏维埃法律的

① 括号中的内容为作者所加。

② 括号中的内容为作者所加。

③ 斯科特提到,除了政治控制方面的成功外,这些社会工程的其他目标无疑都失败了。

非正式实践防止了制度内部与生俱来的巨大浪费和低效率。”^{[1]270} 非正式经济（灰色市场）在俄国的农业中发展起来，从国有部门中“偷来”时间、设备和物资经营自己的小块自留地，提供俄国当时所需的大部分奶制品、水果、蔬菜和肉食^{[1]424}。斯科特最后称米提斯的这种作用为“米提斯的援救”。“如同我们看到的，随正式的指令经济而生的是小贩、以物易物和非法交易。正式经济中的养老金制度、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障是由缺少这些保护的流动人口支持的。同样，机械化农场中的杂交作物之所以能存在，只因为原来存在的本地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和免疫性。在每一种情况下，不规范的实践是正式制度不可或缺的存在条件。”^{[1]484}

国家会容忍事实上支持官方项目生存的非正规实践^{[1]424}。但是，米提斯对社会工程危害的拯救却很少得到官方的承认和讨论。那些威胁到管理精英地位的研究和政策的元素或者完全得不到探讨，或者即使被探讨，也在政策实施中“被舍弃”^{[1]395}。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斯科特并不否认实践知识的局限性。米提斯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和封闭性。它是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传递的，它可能处于潜意识层次^①，不能被理性所容纳，甚至不能系统地表述与教授。另外，由于大部分实验是在缺少适当试验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受到观察能力的限制，他们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1]417}。

同时，“没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也无法自我创造和维持”^{[1]425}。

正式过程与非正式过程相互依存。正式过程不能脱离非正式过程而存在，更不能替代非正式过程；非正式过程弥补、挽救了正式过程的危害和不足。斯科特所主张的社会工程是一种能够正确理解并处理两者关系的社会工程，在这种社会工程中，规划者必须能够谦卑地承认地方知识和实践，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取得成功。

3 结语：建设容纳实践知识和非正式过程的社会工程

站在不同的利益角度来评判一项社会工程的成败，将得出不同的结果。站在国家的角度，它通过剥夺米提斯知识的合法性以及简单化、清晰化等手段实现了政治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斯科特所批评的社会工程并不是彻底失败的；而斯科特将这些社会工程认定为失败，是站在非正式过程的角度来看的。总的来说，斯科特并不反对社会工程本身，而是对极端现代主义社会工程进行了批判。

在书中的结论部分，斯科特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工程观，认为合理的社会工程要符合“小步走、具有可逆性、为意外情况做计划、为人类创造力做计划”等几项原则^{[1]475}。这种社会工程观为“试错”留下了空间，和波普尔的“零星工程”^②

① 吉登斯将之称为“实践意识”。实践意识是行动者知道，但是无法清晰言说的意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不同于潜意识，当然也不同于“话语意识”。本文认为，斯科特所讲的米提斯实际上是这种实践意识，而并非处于“潜意识”层次。这里，本文尊重了译者的翻译。

② 英文 piecemeal 在国内有的翻译成“渐进式的”^[14]，而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5]中文版中则翻译成“零星的”。从我们的理解上看，似乎“零星的”这个翻译更能够体现波普尔的社会工程观念。波普尔反对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乌托邦的工程认为“任何一种理性行动必定具有特定目的”，根据这个目的决定手段，这就是理性。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从整体上重建社会，即“扫荡性的变革”。波普尔将其比喻为“擦净画布”^{[15]301-312}，它要求理性地为全社会制订计划，即使是我们根本没有为此所需的“确凿可靠的知识”。而波普尔主张的是一种“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也就是零星的社会工程。他认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我们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从全盘或总体上改造社会，零星的社会工程相对比较简单，它们是“关于单项制度的蓝图”。“如果它们出了错，损害不会很大，而重新调整并不非常困难。它们风险较小，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较少引起争议。”^{[15]294} 零星的方法允许反复试验和连续的调整。这“意味着把科学方法引入政治事务当中，因为科学方法的全部奥秘是一种愿意从错误中学习”^{[15]307}。这种社会工程是一种“小规模”上进行的，不导致社会的革命性巨变。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试错法得到经验型的社会工艺，逐步建立一种经验型的社会科学。社会的复杂性和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否定了大规模的或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可能性。“渐进的”这个词隐含着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也就是我们可以分阶段地、逐渐地实现一种全盘或从整体上改造社会结构。所以“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翻译成“渐进的社会工程”无法全面和完备地体现波普尔的理论定位。而“零星的”或“零碎的”这个词则可以充分体现波普尔的主张，也就是“一点一点地改革”各项制度，“勤勉的小幅度调整”^{[15]313-314}以消除社会工程或改造过程中的错误，减少整体的乌托邦社会工程给社会、人与自然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巨大破坏。

观极为相似。卡尔·波普尔批判了乌托邦工程从整体上重建社会的狂妄,而主张小范围的“渐进修补”和“摸索前进”的社会工程^{[15]301}。斯科特所赞同的“试错”,是卡尔·波普尔一向推崇的方法。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建议肯定了“人类的创造力”在社会工程中能够起到的神奇作用,肯定了米提斯知识和非正式过程的意义。

正如斯科特所分析的,那些独裁的、极端现代主义的社会工程的潜在破坏性就在于其忽视了“支持复杂活动的实践技能”,也就是所谓的“实践知识、共识、经验、本领、米提斯的实践技能等”^{[1]425-426}。尽管米提斯知识是“不易言传和经验”^{[1]432}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而且它的“地方性”^{[1]434}使其作用范围有限,不过,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实践知识和地方知识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既有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而是解决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斯科特所批判的大型社会工程的失败已经向我们证明,不顾特定环境、时间和空间以及目的,机械地运用一般的规律只能导致实践的失败,而米提斯知识的流动性和适应性却能使之对变动不居、复杂的自然和人类环境能够做出适合的反应,对社会工程设计中所编制的正式程序遗漏的重要因素进行补充,从而挽救僵化的社会工程的失败。

尽管斯科特所批判的大型社会工程都失败了,目前在中国推行的大型社会工程,包括教育资源优化、新农村建设,甚至大型水利工程等项目的运行也饱受争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目前,试图通过社会工程来改善人们生活的愿望仍然是一种普适的逻辑,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做的。所以,否定社会工程的存在以及其“消解社会危机”的工具性价值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我们所要做的,是意识到对社会工程的分析不应该只是工具性的分析,仅仅把关注点放在分析社会工程的效果,评价其失败与否,或如何更好地设计的分析上,这只是一种工具性社会工程学。除此之外,社会工程学和社会工程本身仍需

要一种反思性知识的生产,也就是批判理论和公共社会学维度^[16]。斯科特对现代大型社会工程的批评关键在于,当专制的国家遭遇软弱的公民社会,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由于对现代性与科学的偏执信心不断压制、贬低、排斥实践知识和非正式过程的存在价值与合法性。他们忽视了作为正式过程的国家行为和社会工程恰恰嵌入于非正式过程之中。而这种忽视使得这些现代大型社会工程无法达成目标,造成巨大破坏。因此,我们就必须在特定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在基于对社会工程的嵌入性视角,基于对科学和现代性的反思基础上讨论社会工程之利与弊。

总之,极端现代主义的社会工程的制度偏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它只有嵌入于非正式过程才能真正达到“改善”人们生活的目的。我们认为,在尊重实践知识、保持多样性和反对唯科学主义等方面是哈耶克、波普尔、斯科特和雅各布斯等批评家的价值共识。这也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提供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2] 黄岩. 清晰化和简单化: 隐蔽的治理工具——评人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J]. 青海民族研究, 2008(4): 170-172.
- [3] 鲍磊. 极端现代主义的运作逻辑: 读《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J]. 读书时空, 2005(5): 90-95.
- [4] 高王凌. 《国家的视角》的内层含义[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8(9): 127-128.
- [5] 梁艳利. 现代化进程中权力运作者思维方式的对比分析——兼评斯科特的极端现代主义批判理论[G]//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2009年度): 青年学者文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63-167.
- [6] 吴小彬. 强制的现代化与软弱的公民: 读《国家的视角》[J]. 中国图书评论, 2006(7): 18-23.
- [7] 吕鹏.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J]. 公共管理评论, 2006, 4: 157-162.
- [8]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2004.
- [9] 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10] 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11] M.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Vol.91, Issue 3(November): 481-510.
- [12]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13] 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7.
- [14] 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一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5] 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郑中玉, 王雅林. 工具性和反思性社会工程学[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12).

Social Engineering Based on Embeddedness ——Understanding Scott's *Seeing Like A State*

Gao Yunhong, Yin Haijie, Zheng Zhongy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Scott has given best explanations and criticism on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have failed in 20th century. With extreme faith in science and the rational, high-modernism-oriented social engineering tends to ignore informal process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Meanwhile, informal process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comes to be correction 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disastrous consequence of high-modernism-oriented social engineering. Social engineering will succeed only if it is embedded into informal process and respects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local knowledge. Thus, a reflective dimension is involved in social engineering.

Key words: Scott; social engineering; high modernism; informal process; practical knowledge; reflexivity